

陳維稷傳



薛庆时 蔡静渊 卜大乾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K825.1/1

5-230

陳維稷文傳

薄一波題



此書贈送

中科院書館

一九九二年

(99)年11月18日(星期二)

薛庆时 蔡静渊 卜大乾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维稷传/薛庆时等著.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
ISBN 7-5064-1330-2/K · 0007

I . 陈… II . 薛… III . 陈维稷-传记 IV .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01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100027 电话:010—64168226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10.00 元

序

陈维稷有五个兄弟，他是老三。我是他的堂弟。他大哥的儿子陈法周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青阳县秘密党组织负责人，他的二哥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任民革芜湖市负责人。国共两党在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都出在我们家族的梅溪村，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佳话。在那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对革命都是有功的。

本书第七章中讲到，陈维稷的五弟陈次泽及其家属，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冒险掩护、援救新四军的突围人员，我由此想起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时候，我因事去上海，特地去看望了五嫂胡绮文。这是一位深明大义、极为善良的女性。她伤心地对我说，街道上开会批斗她，辱骂什么她都能忍受，唯独批判她1941年救援新四军是投机，她想不通。她说“1941年共产党还没有得天下，还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投什么机呀。”她满腔忧愤地叹道：“老弟呀，这算什么世道，我实在伤心。”我劝慰她想开些，还譬如说连陈老总（毅）这样的老革命都在挨斗，被戴上各种帽子，我们又算什么呢？她说，这倒也是，并问我为什么现在许多事都弄得颠颠倒倒，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呢？！我讲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我们有多么好的人民。胡绮文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和他们为了革命，临危不惧，奉献、牺牲都在所不顾。革命胜利了，她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果实，可他们对革命

依然一往情深，即使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从不翻悔。陈维稷的家属和亲人就是这样奉献的。

1946年3月，陈维稷托人把我从青阳接到上海，直到1984年1月他逝世，前后历时近四十年。这中间除了七十年代后期我奉命重返上海工作的七年外，其余三十多年差不多都没有远离过他。他对我的一生备加关注，每有进步，总是会心地表示欣慰，要我谦虚谨慎，鼓励有加；每遇曲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则是关心、担心，要我正确对待，经得起考验；平时对我从不指责，而是讲理释义，谆谆善诱。他一直以自身的人格、操守、学问影响我，教育我。他是来自旧社会的官僚世家子弟，又是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明的结合是和谐的。他有中国老一代仁人志士追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又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事业上终身奋斗不懈的精神。他正直、无私、宽厚、善良，待人以诚，处世以公。我们之间相差27岁，对我来讲，他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带路人，他对我成长和一生追求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常想，我国纺织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的纺织大国，这与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卓越工作和创业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钱之光同志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陈维稷配合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揽权争利，从不邀功诿过，从不赶“风”投机。他以一个专家的专业眼光与求实精神，抓科研、教育，培养人才，注重振兴纺织工业的根基；抓标准、定额等，扎实实地从事科学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对外援助，扩大新中国的对外合作与影响；抓出版，重视知识传播；抓学会，广泛团结各个层次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是科学，科学是糊弄不得人的。谁认真耕耘，谁必有收获。陈维稷一生勤于播种，表里如一，老实做人，老

实做事，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经他主持制定的规划、计划、标准、大纲、项目，仍可看出认真、负责的轨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更是一波接一浪，社会上的种种运动都冲击了纺织工业部，并变成了机关内部的人事纷争和路线斗争。“三反”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钱之光同志的工作和他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和冲击。每次都有人找陈维稷做工作，让他站出来，要运用他的影响讲话，批判和反对钱之光。陈维稷都严辞拒绝，认为钱之光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事业心强，功劳很大，不应该反对他。陈维稷处处维护钱之光同志，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挑唆外地造反派要毒打钱之光时，他更是挺身而出，宁愿自己蒙受屈辱，也要保护钱之光。这种“疾风知劲草”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一生见义勇为的高尚品格。我在他们两位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们的为人，他们志同道合，荣辱与共，道义之交是他们几十年交往共事的最好写照。

陈维稷早年为革命舍弃家财，个人没有积蓄。建国以后，因为赡养人口多，生活一直不宽裕。他从不讲生活困难，从不向公家张口要任何东西。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从事一般工作，没有一个搞特殊化的，更没有凭借父亲的地位和权力而谋求私事。他从不要我为他办私事，从不为孩子托情说项。他是廉洁的一生，两袖清风的一生。

《陈维稷传》讲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没有渲染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见伟大。《陈维稷传》一书的描述，体现了生活中的这个真谛。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大量事迹，有的已很久远，有的很难查找资料，但本书的编委、审校、作者

仍不辞辛劳，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代表家属和我本人向为本书付出心血的各位友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们当中，有我的老师，有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我知道，作者在陈维稷的长期领导下工作，对他一向敬重，他们正是用了这种感情，克服种种困难，得以使本书完成采写、编辑、出版。一切有志于追求祖国更好明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看了这本书，都会有所裨益，了解人生之旅，了解成功背后的辛勤，了解和学习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业绩和奋斗精神。



1997年6月30日于
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

前　　言

陈维稷同志是我国纺织界著名的科技专家、学者，是建国初期纺织工业部的领导成员之一，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达33年之久，是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生前参与许多政治活动和外事活动，是一位有声望、有影响、受人尊敬的前辈。

我和陈维稷同志很早就熟悉了。特别是1982年中央调我来纺织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后，与陈维稷同志晤面机会较多。他给我的印象是慈祥和蔼，平易可亲，好学慎行，严以律己，清廉耿介，淡泊自甘。他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任期内，分工主管科学技术、纤维检验、军工生产、纺织教育、书刊出版、对外援助等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表现出炽热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仍克尽职守，不避艰难，排除干扰，坚持工作，竭尽全力减少纺织工业所受的冲击。

陈维稷同志在日常工作中，除参与党组决策外，对培养科技人才，指导科学研究，更新技术装备，制定定额标准，建立规章制度，改革生产管理等工作，均不遗余力，亲预其事，履践笃实，成果卓著，政绩斐然。他从不墨守陈规，审视时代要求，作出了许多奠基性或开创性工作，为日后的继续发展

和完善,留给后人极其宝贵实践经验。

难能可贵的是,陈维稷同志早年从国外学成归来,除从事教育事业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毅然投身革命,与皖南新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在家乡青阳从事抵御外来侵略的革命宣传活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曾以学者身份,通过种种关系,向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抗日大计,并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创办抗日报刊。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利用合法身份,为皖南游击队采购电台。这些传奇式的事迹,他从不告以别人。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谦虚谨慎,宽以待人,党内外人士都乐于与他成为知交。他在联系团结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本书稿,由陈维稷同志的几位老部属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广泛收集资料编写而成。书稿付印以前,他们建议我为这本书作序。我非常高兴为此书写几句开头话,以表达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原纺织工业部老领导的深切怀念。

吴文英

199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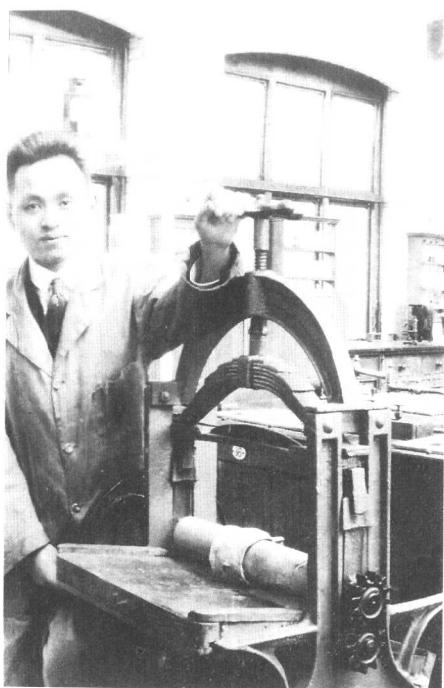


1918年在上海读高中
三年级时所摄



1923年和未婚妻
卢萍初（左二）、
五弟次泽（右二）、
挚友徐璞（右一）
在上海合影

1928年4月
摄于英国



1926年6月在英国里兹大学留学时和同学合影
自左至右：李连山、路秀三、陈维稷、龚明安、陶延桥

1935年4月，华南通大学纺织科染化系师生到上海参观考察





1935年春，陈维稷夫妇和母亲施氏、女儿
玮若、儿子克辽合影



1938年秋，和新四军干部任、刘二君在一起，
左一为陈维稷



1950年7月，在北京东交民巷纺织工业部办公楼前和出席全国机物料研究会的代表合影。前排左八为钱之光，左九为陈维稷



1950年8月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留影。前排左四为钱之光，左五为陈维稷，左六为张琴秋

1952年3月，
赴苏联考察时
摄于莫斯科



1962年3月，与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方佐（右）、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钱宝钧（左）合影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1965年3月，率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访问越南时，在河内受到胡志明（前排左二）、范文同（前排左四）接见



1965年10月，在北京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议定书上签字。
后排左六为谭震林